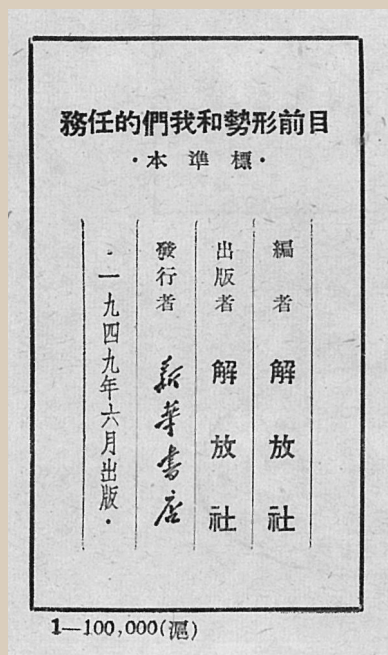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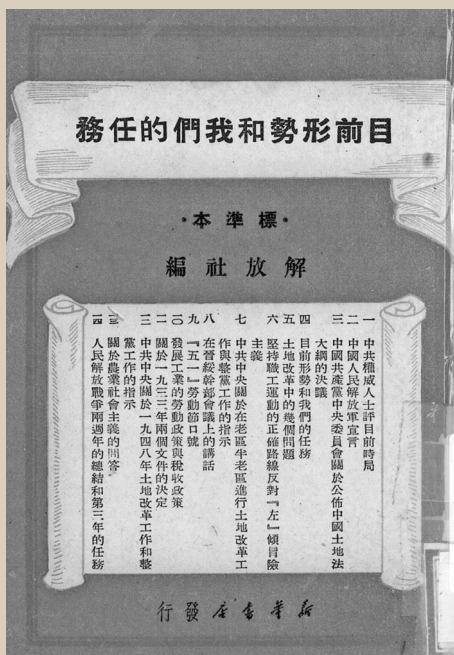


---

## 一、面對轉折——1984年1、2月

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衝擊波——《人民日報》傳出的信息——蔣介石的元旦訓詞——《文藝先鋒》宣布的官方文化政策——《大公報》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信仰



解放社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封面及內頁，1949年6月出版，收錄了1947年5月至1948年7月關於中國共產黨政策的14個重要文件

## 葉聖陶 1948年1、2月日記（摘抄）

1月8日（星期四） 續選教材，寫信。午後五時，開業務會議。報告而外，多為閒談。通貨膨脹益甚，物價跳漲益速，貨物售出得貨幣，將無從取回原貨，因而營業不如不營業之為愈。然開明之機構已不為小，如何維持支撐，實非易事。來日大難，局面不變不成，而變亦將趨紛亂。就一般人生活而言，今後難堪殆將十倍於抗戰時期矣。會畢聚餐，八時歸。

10日（星期六） 上午忽傳斯大林逝世，係英美電訊社誤傳，至晚報出版，始知為謠言。前數日曾傳蘇聯有一要人患癌病，請瑞士某專家往診。今忽聞此謠，足見英美人仇蘇之深。

16日（星期五） 夜七時，讀書會集會，諸人閱讀高爾基之《母親》，討論歷兩小時。（按：這是在中共影響下的進步期刊的編輯人的秘密聚會，除讀書外，還交換有關信息。）

23日（星期五） 放工後，與伯祥趨車至振鐸家，觀其新得之俑。一般之俑多正立，不為動作之形相，此次所得九俑，皆作舞蹈之狀，其一則倚石側立，衣服為粉彩，上加金飾，故為可貴。既而共飲，陳冷盤三十二具，各色不同，皆其家製。酒次談及二十餘年來之往事，歡笑滿座。振鐸藏有較舊之墨，余向索三錠，他人亦各取數錠。辭出後，於車中間談，予同謂振鐸之忽趨考古，亦精力無可寄託之所致。九時半到家。

27日（星期二） ……酒罷，至對面虹光影院，看名片《鴛夢重温》。此片以戰士經受傷，患遺忘病為題材，尚可觀。

28日(星期三) 午後，有一寧海少年丁君來訪，請介紹工作。問其學歷，僅畢小學業。家有田三四畝，由父耕種。兄在寧波讀書。以家況貧困，故來滬找工作。而上海曾無一親半友。問其何以敢冒然出此，則謂高爾基不亦到處流浪，亦工亦讀，以臻成學耶。余告以無能為力，則淚下不止。執其手而別，余心頗為歉然。

31日(星期六) 晨間閱報紙，知甘地被人狙擊身死。……目前世界已裂為兩線，一為人民勢力，一為反動勢力，雙方之鬥爭實不可免，而甘地導之以和平不爭，或為見惡於人之一因。

2月5日(星期四) 夜於收音機聽衛仲樂彈琴，其《流水操》極富描寫之能事。

6日(星期六) 趙梅深自開封來，云將往北平。據談豫省戰況，全省僅三數縣未遭波及。民眾深知雙方作風不同，多以為彼勝於此。而此方軍政界之蠻橫，竟使人幾無生路。為之歎息。

9日(星期一) 得平伯寄示慰佩弦(按：即朱自清)一律，粘之。承告佩弦《不寐書懷》之前四句：「中年便易傷哀樂，老境何當計短長。衰病常防兒輩覺，童真豈識我生忙。」其意想甚蕭颯，為之不怡。

18日(星期三) 下午開經理室會議。瀋陽分店副經理李統漢來書，言瀋陽已成圍城，人心惶惶，渠擬設法撤退。……抗戰期間，我店各分店屢經撤退，不圖今日復睹此局。

1946年11月16日，國共談判破裂，周恩來離開南京前夕招待中外記者，慷慨陳詞，預言「我們不久就要回來」。從那時起，就有不少人每夜通過無線電台，尋找「北方的聲音」。開始還限於親共分子，後來範圍就愈來愈廣，許多國統區的老百姓都習慣於根據「北方」的消息來判斷時局。

1948年元旦一清早，就有人暗暗傳播着昨夜新華社廣播的、據說今天將在中共的《人民日報》（此時報社還設在晉察冀邊區所在地的武安）正式發表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言論相對自由的香港，在茶館酒肆以至電車上，人們都公開地談論着毛澤東先生的這篇文章，並不掩飾自己的或興奮或沮喪或惶惑的反應。五十年後，我們找到了這張顏色已變灰黃的報紙，探尋當年引起震撼的原因。震源大概就在毛澤東宣布了一個國民黨政府竭力想否認卻又掩飾不住的事實：經過17個月的較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得到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數百萬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反攻。而毛澤東由此引出的判斷（毋寧說他指出的事實）卻足以石破天驚：「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捩點。」

毛澤東的文章就這樣把一個無可懷疑的歷史巨變與轉折，由此引發的將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我們所要着重討論的文學藝術的巨變與轉折，推到中國每一個階級、黨派、集團，每一個家庭、個人的面前，逼迫他們作出自己的選擇，並為這選擇承擔當時是難以預計的後果。1948年也因此永遠深埋在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一切中國人（不論當時他們的年齡有多大）記憶的深處，並為後代人所注目：今天人們所關注

的也正是那時不同集團與個人（本書所着重的是以作家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與個體）的選擇與後果。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把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看作是作為主導者與勝利者的一方對這一終於到來的歷史巨變所作的反應與選擇。選擇是明晰而不容置疑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應該力爭不間斷地發展到完全勝利，應該不讓敵人用緩兵之計（和談）獲得休息時間，然後再來打人民。」<sup>1</sup>元旦這天的《人民日報》報頭的新年祝詞：「敬祝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徹底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所表達的是同一意思。這一選擇理所當然地為與中國共產黨有着同樣信仰，或將中國的希望寄託於他們身上的知識分子所欣然接受；茅盾在發表於1948年1月1日《華聲報》上的文章中即表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這次必須一氣完成，我們要有決心。革命事業如果為了缺乏決心而不能在我們這一代徹底完成，而使後一代的仍須付出巨大的代價，那麼，我們將是歷史的罪人，我們是對不起我們的子孫的！」他因此而祝福：「將革命進行到底，讓我們的兒孫輩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來從事新中華民國的偉大建設！」<sup>2</sup>這裏所表達的是這樣一種觀念：為了「新中華民國的偉大建設」，也即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這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夢想），人們可以付出一切代價，包括千百萬人的犧牲。正是這樣的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理想，使許多知識分子在這歷史的關頭選擇、接受了革命。另一方面，在接受必要流血的革命的同時，卻希望這是最後一次流血，這又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他們不懂得，接受了一次流血，就必會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流血。

最激動人心的恐怕還是毛澤東文章的結束語：「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群眾，緊緊地和群眾一道，並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夠超越任何障礙和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

敵的。現在是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這是典型的毛澤東的歷史樂觀主義：堅信真理在手，贏得群眾多數，掌握歷史必然性，只要有了這樣的精神力量，就將無往而不勝。儘管當時不少知識分子並不習慣於這樣的毛澤東式的話語與思維邏輯，但他們仍被那內在的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這些本是知識分子的天性——所吸引。更重要的是，它給中國人民及知識分子展現了這樣一個前景：經濟落後、物質匱缺的東方民族國家，可以依靠精神力量的優勢，克服一切困難，戰勝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這對於近百年來備受列強侵略、凌辱的中國人民，特別是他們中民族情緒最為強烈的知識分子，更是具有超乎一切的吸引力。何況毛澤東的論斷有強有力的事實作依據：戰場上無可懷疑的勝利彷彿也就理所當然地證明了指導戰爭的意識形態的絕對正確與無敵。在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看來，這是一個必然邏輯；但後人卻從中看到隱隱綽綽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觀<sup>3</sup>。當事人在陶醉於這樣的必然邏輯時，又很容易將其推向極端，產生對體現必然性的絕對真理及其現實代表（人民政黨、軍隊、政權）的崇拜。一些本來就好走極端的知識分子尤其容易如此。1948年1月1日出版的《野草》叢刊第7輯發表的郭沫若的文章甚至聳人聽聞地提出了「尾巴主義萬歲」的口號，要求知識分子「心安理得地做一條人民大眾的尾巴或這尾巴上的光榮尾巴」。他後來又寫文章進一步發揮，強調對「人民至上」這類「絕對真理」必須「唯唯諾諾」，「毫無保留地不鬧獨立性」。當有人懷疑會因此而失去知識分子應有的獨立自主時，郭沫若回答說：「對於人民解放的運動，革命程式的必然，科學真理的規範，要發揮『獨立自主』性，那就剛剛流而為『獨裁專制』了。」<sup>4</sup>這是一種真理崇拜的邏輯，對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也是有吸引力的，至少言之成理，但放棄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權利的危險也正預伏於其中了。

在自認為服膺了真理以後，一些知識分子開始自覺不自覺地以進步者自居，將與自己有不同觀點與選擇的異己，輕則視為落伍，重則看作真理的叛徒，進而扮演起真理捍衛者的角色，對異己者大加討伐：這大概也是知識者的通病。元月3日下午，一群已離開了學校的中山大學師生在海邊的一幢洋房的四樓舉行新年團拜，特請郭沫若作了一個題為〈一年來中國文藝運動及其趨向〉的報告。郭沫若在強調要「在毛澤東先生的號召下努力建立人民文藝」的同時，一口氣指控了四種據說是「反人民的文藝」，即他所說的「茶色文藝」、「黃色文藝」、「無所謂的文藝」與「通紅的文藝，托派的文藝」，並第一次點了沈從文、蕭乾等人的名字，而以蕭乾為最「壞」。他宣布，對這些「反人民的文藝」「應予消滅」，即使是作為「文藝上的所謂中間路線」的「無所謂的文藝」，「可能時應開導，爭取，否則則予以揭穿」，同樣難逃「消滅」的命運。郭沫若毫不回避：「要消滅他們，不光是文藝方面的問題，還得靠政治上的努力。」<sup>5</sup>這是第一次按照「非紅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非為人民即反人民」的邏輯，把作家、知識分子分為勢不兩立的兩大陣營，並要求借助政治的力量消滅對方。人們不難注意到新的時代主題詞（「改造」與「批判」），新的哲學（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以及與之相應的話語方式（斬釘截鐵，黑白分明，高屋建瓴，氣勢磅礴……），在歷史轉折的1948年伊始，即已伴隨着勝利的事實與由之引起的狂喜而悄悄產生。在歷史的當時是作為正題而提出，並被愈來愈多的人們所接受，內在危機的暴露則在邏輯與歷史的展開中，這是需要時間的。

在對南方香港的幾家由中共領導的報刊上的郭沫若等領袖人物的文章略作考察以後，我們的注意力還是回到北方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來。1948年初的《人民日報》集中精力於新老解放區的土改與整黨宣傳，很少有本書所關注的思想文化與文學藝術的報導。因此，1月21日



《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央局宣傳部頒布的《晉冀魯豫統一出版條例》引起了我們的特別興趣。「條例」明確規定對各種刊物、書籍實行「黨委審查制」，「取締宣傳資產階級腐朽制度及文化」的讀物，「克服目前出版工作中的投降主義、自由主義、單純營業觀點」。2月11日發表的黨的領導人彭真〈改造我們的黨報〉的講話，強調「報紙的每一句話，每一篇文章，都是代表黨委說話，必須是能夠代表黨的，它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報紙」，也值得注意：其適用範圍自然不止於報紙。人們或許會聯想起周揚幾年前說過的一段話：「在新社會制度下，現實的運動已不再是一個盲目的、無法控制的、不知所終的運動，而變成了一個有意識有目的有計畫的工作過程。」<sup>6</sup>看來這恐非虛言：一個對意識形態（包括文學藝術）進行嚴格控制、統一計畫管理的體制正在建立中。

從這一角度看，1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的音樂家金紫光關於〈高唱戰歌紀念星海〉一文的檢討，是特別有意思的。事情其實很小：作為冼星海的學生，金紫光無非是對老師作出了容易引起爭議的評價，例如認為冼星海的藝術成就已高於聶耳，趕上國際水平之類。這件事後人看來也許真正有意思的是由此給他戴上的「藝術上的投降主義」的帽子，以及引發出來的一些「正面觀點」。例如，「試問，資本主義國家的藝術，有什麼資格來和我們相比較？我們的藝術是進步的，新民主主義的，為工農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藝術，即使我們無產階級粗糙、倉促，或萌芽狀態的藝術品，比較起帝國主義或資產階級象牙塔裏的那些富麗堂皇而沒有靈魂的東西來，也要高明得多。」（《人民日報》的編者仍覺不夠徹底，又加按語，批判道：「站在什麼立場說它『富麗堂皇』？真是『富麗堂皇』嗎？」）「從無產階級的觀點出發，工農藝術在技巧上也是比資產階級優越的，脫離政治、超越時間空間的『技術』是不存在的。」這裏，從觀念到心理、語言，都充滿了勝利者的絕對自信：從

戰場上的勝利推及一切方面（包括文學藝術）的無往不勝的絕對優越，從戰場上的有我無敵，與敵方的任何聯繫均視為叛敵，到一切方面（包括文學藝術）的「敵」「我」不能並存，對異己文化的任何承認都看作「投降」，等等，從戰爭思維、邏輯向文學藝術思維、邏輯的這種自然轉化、推演，在當時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在這（無產）階級優越感、階級自大主義的背後，更是隱藏着民族文化優越感與中華自大主義，它是根植於中國民眾與知識分子意識深處的。因此，這類「東方無產階級優越於西方資產階級」的豪言壯語，在當時以及以後的很長時間裏，都是很能鼓舞人心的。

但在我們敘述的1948年年初，這些「北方」的聲音其傳播與影響的範圍都是有限的。因此，1948年元旦，大街小巷報童們尖聲吆喝的仍是蔣主席（介石）〈對全國國民廣播詞〉。這天早晨10時蔣介石還率領文武百官拜謁中山陵墓。據當天報紙報導，文官一律穿長袍馬褂或中山裝，武官則全著軍服，蔣介石本人也是一身戎裝，他發表了長篇訓詞。

蔣介石的演說，因其不敢正視現實、空洞無物、語言乾枯而不受時人歡迎與重視，與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知識分子與老百姓中不脛而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或許也是人心所向的一個反映吧。但後人（比如今天我們這些研究者）卻會對蔣氏的演說產生興趣：它所顯示的觀念與思維方式是很有意思的。應該說，蔣介石的這番演說並無新意，無非是重申「剿滅共匪以維護國家統一與社會安定」的決心，強調的也是民族國家的統一與穩定，並且以自己為國家利益的代表。但在1948年的中國大多數老百姓與知識分子眼裏，國民黨政府的這種代表性已經顯得十分可疑，其統治國家的合法性受到了強烈的挑戰，再來高喊「維護國家統一、穩定」，在許多人看來不過是對既得利益的一種維護。但蔣介石依然竭力強調這一目標道德上的正義性，一再申稱，「我們

當前剿匪的軍事就是救民與害民的戰爭，救國對害國的戰爭，建設對破壞的戰爭，自由對奴役的戰爭，光明對黑暗的戰爭」。看來至少蔣介石本人從這「正義感」中吸取了某種力量，儘管面對失敗（蔣氏始終回避戰場上的失利，卻承認了經濟上的「危機」），但全篇所說卻是光明的前景。根據呢？據說有二。一是「在過去抗戰革命史上，任何建國的功業沒有不能成功的」，這是用歷史的實踐的成功來證明現實的實踐的必然勝利。二是「事業之難易在於吾人心理之一轉念之間。吾人苟能建立信心，下定決心，以百折不回的精神作再接再厲之奮鬥，則任何困難皆可克服，任何難關皆可打破」。因此，蔣介石在演說裏大談「自力更生」與「全體動員」的力量，揚言任何頑強的敵人「沒有不在民眾的偉力之前整個覆滅的」，這仍是堅信意志、精神力量能創造奇跡，無往不勝：看來蔣介石也是樂觀主義者，他和毛澤東都同是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時代的政治人物。在通篇大講精神的演說裏，唯一的實際內容是對「助長投機，助長囤積，更復走私逃稅，搗亂金融，以加深經濟的失調，而破壞整個經濟基礎」的「商界敗類」的警告。這正是暗示在新的一年裏，經濟上將有所動作。其實在一個多星期前（1947年12月22日）國府下令准免蔣經國外交部駐東北特派員職時，就已經傳出了信號。以後的事情是人們所熟知的：蔣經國率領他的戡亂建國大隊的骨幹，打着「打虎隊」的旗號，開往上海，強制進行幣制改革，打擊豪強，這是國民黨政府對前述歷史轉折所作的回應與選擇：在繼續獨佔政權、不予分享的前提下，進行局部改革，以作最後的努力、掙扎。儘管最初的決心似乎很大，據說打虎隊員在臨戰前曾發出過這樣的誓言：「縱然前面是熾烈的火山，我們可以用熱血把它撲滅，縱然前面是浩瀚的深谷，我們可以用頭顱將它填平。不勝利，不成功，絕不休止！」但這次改革終因目標的不徹底與內外矛盾交困而失敗，國民黨政權的崩潰也隨之成為定局：這都是後話<sup>7</sup>。